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司马迁精神人格论

程世和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司马迁精神人格论

程世和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精神人格论 / 程世和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ISBN 978 - 7 - 100 - 10333 - 6

I. ①司… II. ①程… III. ①司马迁 (约前145或前135~?)
—人物研究 ②《史记》—研究 IV. ①K825.81 ②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1438号



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司马迁精神人格论

程世和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0333 - 6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8

定价: 40.00元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编 委 会

顾 问：霍松林

主 编：张新科 李西建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歌东	尤西林	冯文楼	邢向东
李继凯	李 强	刘生良	刘锋焘
杨恩成	吴言生	张学忠	赵望秦
赵学勇	胡安顺	党怀兴	高一农
高益荣	程世和	傅功振	傅绍良
曾志华	霍有明	魏耕原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工作委员会

顾 问：霍松林
主 任：李西建 张新科
委 员：邢向东 赵望秦 霍有明 刘锋焘
赵学勇 李继凯 尤西林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 1100 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第一，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代”的文化。第二，它是一种相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第三，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其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于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借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 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 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 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

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 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 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

3. 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喜爱,已经入选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

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生于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的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目 录

第一章 生命的崛起	1
第一节 雄强的时代	2
第二节 不羁的灵魂	12
第三节 著史：生命的宣言	24
第二章 走向历史	36
第一节 卓越的史识	37
第二节 无畏的勇气	57
第三节 深广的人生情怀	68
第三章 生命的颤抖	88
第一节 李陵之祸：异端者的悲剧	89
第二节 置之死地而后生	101
第三节 伟大的狂惑	112
第四章 英雄的传奇	122
第一节 敢于赴死的英雄	122
第二节 敢于不死的英雄	151

第五章 伸张冤屈的灵魂 170

第一节 李广：沉寂的自杀 171

第二节 韩信：兵仙之死 183

第三节 在其他血案的背后 200

第六章 人的深层探索 211

第一节 “不自知”的悲剧 212

第二节 人性之恶 227

第三节 史公：生命的洞察者 250

第七章 历史的炼狱 260

第一节 死亡：一个强烈的主题 260

第二节 面对天道的“不仁” 270

第三节 历史与价值的冲突 282

第四节 宇宙茫茫 挽驾何所 298

第八章 面对现实与未来 303

第一节 现实：走向衰败的深渊 304

第二节 思来者：留给世界的遗言 313

结语 《史记》：一个伟大人格的凝聚 318

附录一 舍暴力之祸而取和平之福

——刘邦、项羽与韩信成败转运的意义分析 321

附录二 代天子立言

——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 343

后记 372

第一章 生命的崛起

根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于昭帝之初（约公元前86年）。司马迁的一生大体上与汉武帝刘彻统治的时代相终始，正值西汉全盛时期。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认为：“每个人都是它的时代的骄子。”^①“每个人在各种活动中，无论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科学的活动，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他有一个任务，要把当时的基本内容意义及其必有的形象制造出来，所以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替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合适的艺术表现。”^②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受“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支配，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民族的儿子，同时也是他自己时代的儿子。在我们看来，所谓“民族的儿子”，就是对本民族历史“知之深”、“爱之切”^③，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核心价值责任；所谓“时代的儿子”，就是能与自己的时代感同身受并特立于时代峰巅之上，成为时代标志性的精英人物。

①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②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5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引论”第2页。

司马迁身逢汉武盛世，深深感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开始了使自己成为“民族之子”与“时代之子”的精神历程。

第一节 雄强的时代

《太史公自序》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从汉高祖正式建立汉朝（公元前202年）以至于汉武登基（公元前141年），历史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正是在这—个甲子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民族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至楚汉相争数百年的天下大乱，迎来了“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①汉武盛世的诞生。汉武盛世最为明显的特征，在于以宏大的世界图景与精神视野，对内确立以儒化治天下的正统，对外确保大一统中国的神圣不可侵犯并缔造出大中国辽阔疆域。以上两方面的内外经营，造成了一个既有内在文化蕴涵又有强大国力抵御外族侵扰的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诞生。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汉武盛世的出现是汉兴七十余年“积善累功”的结果。汉兴之初，由于暴秦滥用民力以及秦末战乱，社会经济严重凋敝。《平准书》载：“汉兴，接秦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面对民生破败的社会现实，汉初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正确对策。《萧相国世家》载：“（萧）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相国世家》载：“（曹

① 桓谭：《新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6页。

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对此,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赞曰:“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此之后,文帝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将“务在养民”^①的“大汉之德”推向了高峰,并由此成为“大汉之德”最具典范性的代表。《汉书·景帝纪》言,“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说明了汉初以德立本的历史过程。正是由于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即位时,汉王朝的经济力量已十分雄厚。《平准书》载:“至今上即位数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上,我们民族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物质富足。空前富足的物质基础造成了汉帝国雄狮般的强健体魄,而汉帝国重新审视世界的雄心也就随之诞生。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②雄主汉武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即位而开发大志”^③,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潜在动力,并开始了把这种潜在动力现实化的宏伟计划。为此,这位注定要统治中国命运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天子向世人发布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诏令。其建元元年夏五月诏曰: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同上。

③ 桓谭:《新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546页。

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①

少年汉武帝即位之始，以天地大德观念礼祠河海山川，开始了以天地人三才为中心的世界谋划。盖因有礼祠河海山川的大视野、大眼界，汉武帝立下了经营四方而务使中国壮丽河山不受侵犯的雄心壮志。六年后，元光元年夏五月，汉武帝又诏举贤良曰：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②

汉武帝以“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的怀抱，已然感到自己在中国历史上负有复兴王道的神圣使命，发出了复兴王道的时代呼唤。汉武帝对复兴王道的时代呼唤，犹如晴天霹雳，响彻在大汉精神上空而经久不息，激荡起天下士人与汉武帝一同重续王道历史的时代雄心。可以说，一种伟大事业、一种非常之功已潜藏于现实之中，汉武帝当务之急就是要在茫茫人海中召唤出一批非常之人，为他所统领的时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同上。

代鼓荡起“教通四海”、“猗与伟与”的风云之气，实现时代的客观精神。黑格尔曾这样说道：

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了。^①

我们应该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做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词。^②

伟大人物是时代意志的代表。据此，黑格尔把拿破仑称之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汉武帝彻亦复为身居在长安城未央宫里的“世界精神”。他意识到了历史与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向社会、向世界敞开了胸怀。他的那一封《诏举贤良令》无疑是创世纪的时代宣言。

正是在一种创世纪的激情中，汉武进用英俊，内外经营，平定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控制了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深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又大力出击匈奴，通西域，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中亚一带。所有这一切，都无不显示出大汉帝国无与伦比的进取心及强大国力。“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

① 〔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3页。

②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第28页。